

珞珈史学文库
LUOJIA SHIXUE WENKU

“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成果
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古礼新研

杨华 著

GULI XINY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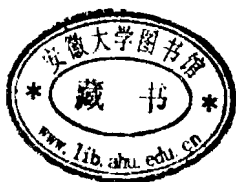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

“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新资料整理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研究”成果
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古礼新研

杨华 著



商务印书馆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礼新研 / 杨华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珞珈史学文库)
ISBN 978-7-100-07555-8

I. ①古… II. ①杨… III. ①礼仪—中国—古代—文集 IV. ①K89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850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古礼新研

杨华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07555-8

2012年3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201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2 3/4
定价: 58.00元

总 序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集合。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 1913 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 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 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 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梗、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璆、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

改革开放 30 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1981 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 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 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 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7 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 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1 年，中国古代史再次被列为国家重点学

科。2007年，中国古代史第三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新增为国家重点学科。2008年，历史学一级学科入选湖北省重点学科。2001年，以中国古代史为核心的国家“211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中国文明进程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启动。2008年，分别以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史为中心的“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新资料整理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研究”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启动。目前，历史学院设有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三个本科专业；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和地区国别史等12个二级学科。在研究机构方面，设有中国3至9世纪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15至18世纪世界史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研究所，以及简帛研究中心、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在前一辈学者奠定的基础上，经过后继者的持续努力，逐步形成了严谨的学风和优良的教风，确立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断代史与专门史、地区史与国别史相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学术特色，成为武汉大学在海内外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之一。

历史学院的老师，在辛勤教书育人的同时，也为科学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各自从事的方向或领域，推陈出新，开拓前行，撰写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学院决定编撰教师个人的学术文集，是希望各位老师把自己散见于海内外各种出版物上的代表性论文加以整合。这样，通过一种文集，可以约略体现教师本人的研究历程和领域；而于整体方面，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武汉大学历史学的学科格局和学术风格。

每本文集的选篇和修订，由作者各自负责。学院教授委员会对人

选文集进行遴选，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珞珈史学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国家“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支持，得到了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的支持，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各位领导和相关编辑先生的支持。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0年2月

目录Contents

前言：礼乐制度与中国传统文明 1

从“制礼作乐”到“礼崩乐坏”

——先秦时期的礼乐制度 17

“谅闇不言”与君权交替

——关于“三年之丧”的一个新视角 48

先秦血祭礼仪研究

——中国古代用血制度研究之一 87

先秦衅礼研究

——中国古代用血制度研究之二 115

楚简中的“上下”与“内外”

——兼论楚人祭礼中的神灵分类问题 136

说“举祷”

——兼论楚人祭祖礼的时间频率 167

襚·赙·遣

——简牍所见楚地助丧礼仪研究 197

楚礼庙制研究

——兼论楚地的“淫祀” 226

楚简中的诸“司”及其经学意义 263

楚地水神研究 287

新蔡楚简所见祭祷礼仪（二则） 313

新蔡楚简祭祷礼仪杂疏（四则） 337

战国秦汉时期的里社与私社 348

“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 379

说“谪”

——兼论汉代政治谏告理论的民间基础 402

上博简《天子建州》礼疏 423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 451

《序宁祷券》集释 483

作者主要著述列表 509

后记 514

前言：礼乐制度与中国传统文明

一

研究中国文明乃至整个东亚文明时，有一个重要的内容不能忽略，那就是“礼”。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礼”这个词，很难用一个西方的词汇加以翻译。可以译作 Ritual、Rite、Ceremony、Manner、Polite、Courtesy、Propriety 等等，但都不够准确，没有完整表达出“礼”的内涵。在中国文化中，说到“礼”这个范畴，我们一般理解为以下四个层次：

第一是“礼物”。《礼记·曲礼》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同篇有“礼不下庶人”之句，根据东汉郑玄的注释，就是因为庶人无力准备礼器、礼物。

第二是“礼仪”。指古代贵族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举行的一些重要的仪式和程序，这些仪式和程序十分复杂，内容极多，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①之说。中国古代专门研究礼制的礼学家，一般把它们分成五类，即吉、凶、军、宾、嘉，而每一类下面又有很多条目，其中，仪式是礼制的主体，也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中国在古代素来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国人也以此为自豪，比如唐代

^① 《礼记·礼器》。

人就认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①显然，中国古代人认为这是他们区别于蛮夷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是“礼法”。这是根据礼的核心原则制定的一些国家典章制度，比如说官制、田制、军制、婚制等等。这些制度，有些就是法律或者法令，有学者把它们总结为“律令制度”。律令制度是中国古代影响东亚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所谓“东亚文化圈”的四大标志之一。^②

第四是“礼义”。孔子曾经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③意思是说，礼乐制度所造就的等级观念、社会秩序和人文教化才是最重要的，牺牲玉帛、周还揖让只是礼的表象。

中国古代关于礼制的文献，主要是被称为“三礼”的儒家经典，即《仪礼》《周礼》和《礼记》这三部书。关于这三部书的写作年代，历代存在不同的观点。现在看来，它们的核心内容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是编辑成书的具体年代目前还不能确定。《仪礼》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由孔门弟子编辑而成的一个礼制手册。^④而《周礼》则是一部上古的职官名单，记载了360多个职官的功能，是一个十分严密的政治宪章，关于这本书的形成，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代说、西汉说等不同观点，

① 《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

② 根据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的概括，构成“东亚文化圈”的共同要素包括汉字、儒教、律令制度和中国化的佛教四方面。见氏著《东亚世界的形成》，《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8页。

③ 《论语·阳货》。

④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原载《文史》第15、16辑，后收入氏著《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页。有研究表明，早期的儒家就是以“相礼”（主持礼仪活动）为生的，那么这个手册的形成也是势所必然。

还有学者拿里面的职官材料与西周的金文记载进行过对比，发现很多是相同的（详下）。而《礼记》则是汉代人编的一个论文集，它收录了战国以来孔子门徒们讨论礼学的文章，也收录了先秦时期部分礼制活动的仪式记录（这些内容与《仪礼》的性质差不多）。^①

“三礼”文本（实际上是“四礼”），^②记载了大量的礼制活动，十分详细，可以与儒家的其他文献互相印证，来说明上古时期中国人确实曾经举行过这些礼仪。例如，《仪礼》这部书，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礼》《燕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等十七篇。每一篇所载的礼仪活动之繁琐、复杂、周到，不仅在世界其他文明的文献中罕见，就是汉代以后的中国经学家亦常常感叹“难读”，唐代的韩愈就曾有过类似的感叹。现举几例：

《仪礼》的首篇是《士冠礼》，它记载的是中国上古人的成人仪式。男谓“弱冠”（二十岁），女谓“及笄”（十五岁）。其仪式包括：

- （1）行礼前准备：筮日、戒宾、宿宾、筮宾、为期；
- （2）三加：始加（缁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
- （3）宾礼冠者；（4）冠者见母；（5）宾字冠者；（6）后续仪节：冠者见兄弟、姑姊、国君、乡大夫、乡先生，礼宾，酬宾，归宾俎。

① 关于《礼记》的最新研究，可参看王锸《〈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② 汉代礼学家戴德编辑的礼学论文集叫做《大戴礼记》，其侄子戴圣编辑的礼学论文集叫做《小戴礼记》，二者所收录的文本有相同的部分，但大部分内容并不重复。东汉以后，小戴的地位高于大戴，成为官学文本，目前“十三经”中的《礼记》就是小戴的文本。

这里面每一道程序又包括了若干个节目，如果不了解上古中国人的建筑、服饰、饮食、亲属关系等等，根本就读不懂这篇文献。又比如，《仪礼》中记载上古婚礼的仪式，包括：

(1) 纳采：男家向女家送礼，以示求亲，授雁；(2) 问名：问女方姓、氏、字；(3) 纳吉：卜得吉兆，使者来告女家；(4) 纳征：致送聘礼于女家；(5) 请期：告知女家结婚日期；(6) 亲迎：黄昏时婿至女家迎亲（婚者，昏也）；(7) 共牢合卺：共食、合卺（共饮，前二次用爵，第三次用卺）；(8) 妇见舅姑：次日天明拜见公公、婆婆，成为家中一员；(9) 庙见：如舅姑歿，则必三月后行朝庙之礼。

这些程序，经历了几千年，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在实行着，并没有中断，它基本延续到了 20 世纪的上半叶，当然这与后来历代王朝的强化推行有关（详后）。直到今天，在中国的乡间，仍然可以见到它们的踪影，这正是孔子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表现。

中国古代有一种专门研究礼制的学问，叫做“礼学”，它是儒家经学的重要一支。由于礼的内容太繁复，历代礼学家都试图根据儒家经典来复原上古时代的礼制，同时又试图制定出符合当时社会生活内容的礼制，所以礼学在每一个朝代都十分重要，它与当时的政治生活紧密相关，礼学家也不单纯是一个学问家，而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活跃成员。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儒家经典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再加上礼制活动被视为“反动”“腐朽”的代表，所以这门学问在 20 世纪几乎完全中断，目前真正熟悉传统礼仪程序的人已寥若晨星，研究礼经和礼制的学者也已很少了。

二

那么，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如此细密、繁复的礼仪程序？为什么中国人会制定如此细密、繁复的礼仪程序？换言之，礼的起源是什么？

不妨举丧葬礼仪为例，因为它很容易在古代的墓葬发掘中得到证明。《仪礼》中有《士丧礼》《士虞礼》等，记录了上古时期中国人的死亡和丧葬仪式，它包括：

(1) 临终：移居正寝、问疾、禱“五祀”；(2) 始死：招魂、迁尸（北牖→南牖，南首）、楔齿、缀足、设奠、设帷堂、讣告、设哭位、君及宾客致吊和禭、设铭、浴尸、饭含、袭（衣三称）、设重、设燎；(3) 小敛：陈小敛衣、陈小敛奠、小敛（士十九称）、凭尸、移第堂上、主人系首经腰经、设小敛奠（堂上）、送宾、代哭、致禭；(4) 大敛：陈大敛衣、大敛具、入殓具、大敛（衣三十称）、入殓（西阶处）、设大敛奠（室内）、送宾、就丧次（门外东墙下倚庐、垕室）；(5) 成服：五服（此前已佩有腰经首经，斩缞、齐缞、小功、缌麻）、朝夕哭、朝夕奠；(6) 入葬：筮宅、卜日、视椁及明器、启殓、朝祖、宾赠賻、大遣奠、发引、入圻；(7) 葬后：反哭、虞祭（三次）、卒哭（三虞次日）、班祔、小祥（一年、练祭）、大祥（二年）、禫（大祥间月）。

这些程序，在目前发掘的东周（也就是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大都得到证明。^①例如，马山

① 相关研究十分丰富，可参曹建敦《东周祭祀研究》，清华大学历史系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彭林教授指导。

战国楚墓出土的女墓主，其包裹尸体的方法和层数（21件）与文献记载大体一致。^①在南部中国的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卜筮祭祷简，记载着墓主生前患病阶段祭祷神灵的时间、地点、仪式、神灵名称，这些与礼书文献所载也基本吻合。而埋葬在棺槨中的赠书（吊丧时送礼的清单）、遣策（所有随葬物品的清单）大量出土，与礼书上的说法也基本相合。^②

如果再向前追溯，“三礼”中的内容，在商、周时期也有使用过的痕迹。2005年年底发掘的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倮伯”及夫人墓葬M1中，出土了罩在棺材上的丝织品，上面绘有图案，这正是“三礼”文献所记的“荒帷”。此墓的下葬时间为西周中期，说明西周中期的贵族丧葬仪式与《仪礼》的记载基本相同。这种棺上罩以荒帷的葬俗，近年来在河南新郑战国墓、江陵战国楚墓（如马山M1、九店M410、太晖观M50）中都有所见，可知这种礼俗在先秦时期从未间断过。这种风俗在汉代前期的南方墓葬中，都得到延续。又比如，金文中记载有不少与军事礼仪有关的内容，见于《小孟鼎》《虢季子白盘》《敌簠》等铭文，有学者已将它们与《逸周书·世俘解》和其他礼书相对证，发现文献所载的军礼在西周时期确实曾经实行过。^③

对《周礼》中的官名，中国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尝试利用青铜铭文进行对证，郭沫若、杨筠如、斯维至、陈梦家和张亚

① 参江奇艳《战国时期楚国丧礼中的棺束与棺饰》，《考古》2004年第6期。另参江奇艳《战国时期楚地丧礼中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历史系2002年硕士毕业论文，杨华教授指导。

② 参收入本文集的拙作《襚·赠·遣——简牍所见楚地助丧礼仪研究》、《“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新蔡楚简所见祭祷礼仪（二则）》、《楚礼庙制研究》等文，另参拙著《新出简帛与礼制研究》，台湾古籍出版公司2007年版。

③ 高智群：《献俘礼研究》，《文史》第35、36辑。

初、刘雨等学者都有论著出版，因为各自利用的金文材料有多有少，所以结论也不一致。张、刘二氏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是最为系统的一种，其结论是：“《周礼》在主要内容上，与西周铭文所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的地方。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周礼》，是西周职官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①李学勤等学者也指出，秦汉法律简牍的解读已经证明，秦汉的法律体系中有不少条文来源于《周礼》的记载，换言之，《周礼》的礼制规定要早于秦汉法律。^②

目前的研究表明，礼制的使用至少可以上推到商代。例如，宋镇豪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商人射礼中存在“弓”、“迟弓”、“疾弓”等竞技规则，十分注重用弓和弓法，以实射猎物为主要形式，视射获猎物有无废矢而品论优胜，进行颁功赐，射后有享祭先祖之礼。这与礼书所记载的周代射礼有直接的渊源关系。^③这些结论直接来源于最近所出的甲骨文材料，说明商代的礼制活动已经比较规范了。

如果再向前追溯，在中国文明起源初期，礼制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特点。学术界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志一直存在争论，一般认为文字、青铜器、城市、国家是一个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基本要素。在中国，城市的特点是礼仪性建筑，这些礼仪性建筑是什么呢？这就是礼书中归纳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④，可以说没有宗庙建筑，就谈不上城市。另外，中国最早的文字（如甲骨文、金文），记载

①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② 李学勤：《秦律与〈周礼〉》，氏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118页。

③ 宋镇豪：《从花园庄东地甲骨文考述晚商射礼》，《中国文物研究》2006年第1期。

④ 《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的正是祖先祭祀的内容。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并不是生产工具，而是作为祭祖礼仪的法器而存在的。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中国早期文明的出现，并不是靠生产技术的突破，其直接推动力之一可能正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制活动，这也是中国早期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模式的特点之一。从礼制的视角可以重新谱写西周以前近万年的中国早期历史。^①

近人王国维的研究指出，“禮”这个字的初现，就是向神奉献祭品的象形。《说文》“禮”字从示从豐，清人段玉裁注谓：“豐者，行礼之器。”王国维进一步引申说，“豐”之上半部“从珏在口中”，“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而“豐”之下半部，则是笾豆供奉的器形，常见于甲骨文、金文之中。王氏谓：“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卣，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亦通谓之禮。”^②从“禮”这个象形字的创字过程来说，中国早期文明是伴随着礼制的举行而出现的。

说到中国早期文明中的礼制，有一个现象可能为其他文明中所罕见，那就是礼与乐相伴出现、相偕存在。按照礼书的规定，这些礼制性的仪式活动都配有音乐，例如祭礼、乡饮酒礼、飨礼、射礼、军礼、燕礼等等。在中国早期文明中诗、歌、舞、乐合为一体，所以这些礼仪活动中的“乐”，实际上包括很多内容。这种“礼乐相须”的制度，叫做礼乐制度。西周、春秋时期宫廷中用以与礼制相偕配的音乐，当时人谓之“雅乐”，其意思是正统、高雅之声。研究表明，这种雅乐其实是以钟、鼓、磬为基本和声的打击

① 张光直：《从商周青铜器谈文明与国家的起源》、《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载氏著《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版。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王国维：《释礼》，氏著《观堂集林》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291页。

乐队；后来才出现的丝弦乐，在当时都被认为是不合礼制的“新声”。在先秦时期，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礼，再用什么样的乐来与之相搭配，什么等级的贵族可以享受什么样的礼乐，都规定得十分明确。^① 现在的研究，可以复原春秋时期贵族们举行礼制活动时分别唱了什么乐歌，但仅仅知道歌名，乐调早已不存。^②

三

秦汉帝国实现了文化的大一统，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影响中国达两千多年。于是，作为儒家文化核心内容的礼乐制度，也成为历代王朝特别重视的文化建设项目。“功成作乐，治定制礼”^③，每当新的政治集团夺取政权之后，便着手进行礼乐制度建设，这不只是一项文化工程，也是彰显他们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措施。

历代都有所谓“议礼”，通过这种礼制大讨论，制定符合本朝的礼乐大典，如隋朝有《开皇礼》《仁寿礼》《江都集礼》；唐代有《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宋代有《政和五礼新仪》；明代有《大明集礼》《大明会典》，清朝有《皇朝三通》《大清会典》《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等。在中国的二十五部历代正史中，有十七部专门列有《礼志》《乐志》或《礼乐志》；有十五部列有《律历志》（或《历志》），其中八部专门讨论

① 参拙著《先秦礼乐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②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是完全配乐的，可以演唱，但是在战国时期这些音乐渐渐与诗歌分离了，后来流传下来的唯有歌词。

③ 《礼记·乐记》。